

为英语“文学道路”正名

殷企平,陈姝波

(浙江大学 英语语言文学系,浙江 杭州 310028)

[摘要]近年来,在我国高校英语教学中,“文学道路”成了贬义词。在这一现象背后,潜伏着这样一种普遍的假设:英语教育旨在摄取信息、掌握技巧,获得实际知识和技能,而文学则仅仅是一件饰物——只能用来点缀以市场经济这个硬核为主导的课程表而已。为了抵制这种趋势的蔓延,有必要首先弄清楚以下几个问题:我国英语系的基本任务是什么?英语文学教学是否与当今市场经济存在关联性?它们又是怎样相互关联的?我们怎样才能使当代中国人确信学习乔叟和莎士比亚等人的作品——倾听那些既非本国,又非现代人的声音——是有益处的呢?在重新认识这些问题的同时,有必要改进当前仍在流行的一些教学方法,以确保文学在英语教学中应有的地位。

[关键词] 英语文学; 英语教学; 文学的价值

[中图分类号] G642.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942X(2002)06-0102-06

曾几何时,在我国高校的英语教学中,“文学道路”^①成了贬义词,文学内容在不少高校英语专业教学大纲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甚至在某些高校中被挤压得无影无踪。否认或轻视英语文学价值的思想不仅体现在某些官方文件和用人单位的聘任政策上,而且还体现于形形色色的实用性教材的序言中,体现于那些提出“文学道路的末日”、倡导“实用英语”的前卫人士的“改革宣言”中,体现于一些学生要求把莎士比亚(如果不是一切文学的话)从英语课程表中驱逐出去的请愿声中,更体现于那些一心指望孩子捞到一张就业门票的家长们的抱怨声中——他们的牢骚确实事出有因:许多用人单位垂青的是那些主修过“科技英语”、“外贸英语”等实用课程的毕业生,因为后者似乎能立刻为他们创造利润。

在最近修订出台的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以下简称《大纲》)中,文学课的教学时数不到总时数的10%[1](pp.3-5)。不过,问题的关键倒不在于通常要到三年级才开设的这些文学课的百分比上。《大纲》的真正缺陷是,它将以前的“精读”课(如今的“基础英语”和“综合英语”)纳入了“专门技能课程”的范畴,这为眼下盛行的、将文学排挤出一年级、二年级课程的做法开了绿灯。我们知道,文学曾经在精读课中占有相当的比重。自20世纪60年代沿用至80年代初,并深受大家欢迎的精读教材是许国璋编写的《英语》。它共分4册,分别供一年级与二年级4个学期使用。教材第1册就开始介绍诸如寓言、传说和诗歌这样的文学样式。在第2册的总共17篇课文中,有9篇是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其中有希腊神话《点石成金》,奥斯卡·王尔德的短篇小说《忠实的朋友》,欧·亨利的短篇小说《爱的奉献》。在第3、第4册中,文学体裁的课文所占的比例则更高。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1986年以来被广泛用作一年级、二年级精读教材的李观仪主编的《新编英语教

[收稿日期] 2002-02-21

[作者简介] 1. 殷企平(1955-),男,浙江杭州人,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西方文论和英国小说研究; 2. 陈姝波(1968-),女,浙江余姚人,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系副教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和澳大利亚文学研究。

^① 在我国的传统英语教学大纲中,文学内容占有较大的比重。这种教学模式常常被称作“文学道路”。

程》中，几乎没有一篇纯文学的课文，这充分说明我们现在的学生在升入三年级开始正式上文学课时，不再是有所准备的，至少是准备不足的。

更糟的是，我们的许多英语专业学生甚至在四年的大学学习中没有上过一门文学课。不久前，有关方面对国内五所名校的一项调查显示，1993级外语专业有13%的毕业生甚至到了三年级、四年级也没有接触到任何类型的文学课。^②(p.4)当然，造成这种局面的因素很多，其中师资短缺可能是因素之一。但不管怎么说，所谓的“实用英语系”在国内许多地区争先恐后地登台这一事实，无疑向我们提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通往文学殿堂的大门是否被人为地堵塞了？

在所有这些现象的背后潜藏着这样一个普遍的假设：英语教育旨在摄取信息，掌握技巧，获得实际知识和技能，而文学则仅仅是一件饰物——只能用来点缀以市场经济这个硬核为主导的课程表而已。总之，“实用”已经成了当今使用频率最高、最时髦的词语。尽管这一词语听起来挺诱人，但是它所包含的思想是错误的、有害的，甚至是致命的。那种宣传“实用英语”的大纲的最大危险，在于它会对大学的根本理念产生腐蚀性的影响。哪怕那样的大纲确实在实用技能的训练以及某些知识的传授方面卓有成效，它还是以牺牲教育的基本原则——如培养全面发展的、具有个性和创造性的人才为代价的。彼得·阿巴斯在七年前出版的一本书中，曾批评了当时英国存在的一种倾向，即把“训练”和“教育”两词相提并论，“使它们的含义相互靠近，并将它们混为一谈”^③(p.14)。这样的批评不也同样适用于我国的一些高校吗？在类似于以上指导思想的作用下，一些高等学府已经变成了职业培训基地。正如彼得·阿巴斯在他的另外一本书中所说的，在那样的培训机构里，“个人沦落为在传送带上移动并被填入有用知识和必要技能的、被动的容器。其结果……是学生产生了深刻惰性：反应迟钝，毫无主见——或者可以被描述成病态的倦怠”^④(p. 2)。像这样病态的且毫无头脑、反应迟钝的人还能有用吗？

如果说训练是狭隘的、排他的，那么教育则是广泛的、包容一切的。换句话说，一个训练有素的人可能不是一个具有良好教养的人；而一个具有良好教养的人则一定是训练有素的人。早在150年前，约翰·亨利·纽曼就指出，如果硬要给大学课程一个实际目标，那么，它只能是“训练社会的良好成员”^⑤(p.134)。根据纽曼的观点，“本身好的东西不可避免地要发挥多种外在的用途……它必然会给社会带来好处。这种好处的大小和多少跟它本身内在的优秀品质成正比”^⑥(p.137)。如果文学有助于培养优秀的社会成员，那么它也应当被认为是有用的，而那些把文学与实用知识对立起来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简而言之，文学是好的，因而它必然是有用的。

有人可能还是要问：文学的用途体现在何处？作为一门学科，文学在培养学生的想像力和创造力方面无疑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英国大文豪利维斯(F. R. Leavis)曾就此发表过高论，其观点尽管不无瑕疵，但不妨引来作一例证：“文学的重要性不仅仅是因为它本身很重要，而且还因为它蕴藏着创造性的能量；后者在现代‘商业化’的社会中到处都处于劣势。在文学中，或许只有在文学中，一种鲜活的、创造性地运用语言的感觉仍然显而易见，这与‘大众社会’里语言和传统文化的贬值和庸俗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个社会的语言质量是其成员个人和社会生活质量最有说服力的标志：一个不再珍重文学的社会是一个致命的、封闭激情的社会，而激情创造并维持了人类文明的精华。”^⑦[6]

尽管利维斯所说的“人类文明的精华”一词的所指尚有疑问之处，但是对他关于商业社会中语言的抽象化和贫血症的观点，恐怕谁也不会表示异议。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商业化的趋势在许多国家(我国也不例外)的诸多社会生活领域里可谓愈演愈烈。所有这些国家都面临着重振语言活力的

^① 这一段话是伊格尔顿对利维斯有关观点的总结。见 Terry Eagleton, “The Rise of English”, 载 *Falling into Theory*, ed. David Richter, Boston: St. Martin's Press, 1994, P.50.

艰巨任务,而语言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活力源头则是文学。一个没有文学的民族,必然是没有活力的民族。

然而,为什么偏偏要一个中国学生去专修英语文学呢?阅读乔叟和莎士比亚等人的作品——倾听那些既非本国人,又非现代人的声音——到底有何益处呢?在《与未来沟通》一书中,堂纳德·斯通就学习外国文学的价值问题所作的论述为我们做了最好的解答。正如当年在伊顿公学演讲时的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那样,斯通致力于人在道德和智力上的“解放”,而这种希望则被寄托于一种对话原则,即跟他人的世界对话,并“在另一个世界发现自我”^[7](p.1)。就阿诺德的演讲而言,斯通所最喜爱的——也应该是我们最喜爱的一句话是:“知彼才能知己,知己才能改错,才能获得拯救——我们的问题是我们未能做到这一点。”^[8]阿诺德指出的问题,也未尝不是我们如今所面临的问题?眼下的中国再也不像“文革”前那般封闭和孤立,而正在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参与一切国际事务,我们怎么可以不力求对别国知根知底呢?

至于古代外国文学的价值问题,斯通也有同样出色的回答。在他看来,文学是一个过去和现在之间永不完结的对话,它应该不断接受考验,在代代相传中新意迭出。像阿诺德和伽德玛一样,斯通在希腊文化中——尽管那是古老的异国文明——看到了最永恒的“现代”观,因为“对我们来说,过去文化作品中对真理的主张和公共价值观永远具有现代性”^[7](p.117)。当然,不少昔日的主张和公共价值观可能不那么正确,甚至还有谬误。我们之所以说它们具有现代性,是因为它们激发我们的思考并与我们形成一种对话关系。一个英语教学大纲如果不回顾过去,无视那些尤其体现在以往文学作品中的文化遗产,那是对英语语言的严重割裂。

因此,对我们的高校英语系来说,让学生接触各种声音并培养他们树立多元文化的观念是至关重要的。假如把文学从我们的英语教学大纲中分离出去,我们的学生就无从具有真正意义上的跨文化视野。也许有人会说,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在我们的课程设置中,跨文化交流已经得到了应有的重视——确实,近年来,以“跨文化交流”的名义开设的课程远比文学课处境优越。可是,除非破坏语言本身的有机结构,语言和文学是密不可分的。正如任何文学作品必须被置于与别的文学作品的关系之中,否则就不能被人充分理解一样,任何一种语言在文学被剥离的情况下也是不能被人充分理解的。再者,文学是一个社会文化最丰富的宝库。离开文学,任何所谓的“跨文化交流”必定是肤浅的。唐纳德·斯通曾经把学习外国文学比作“出游”,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回‘家’”^[7](p.109)。同理,没有文学的英语大纲是一个回不了“家”的大纲。

还应该指出的是,一个真正走“文学道路”的人通常比那些仅局限于选修狭隘、零碎的“实用”课程的人具有更扎实的技能和文化知识。原因很简单:尽管一门设计得当的文学课不会以单独训练某套特定的技能为目的,但是它往往以各项技能的内在化为前提。正如教育不排斥训练那样,以教育为本的文学课同样不排斥语言技能和会话技巧。文学是以语言为媒介的,一部优秀文学作品的标志之一,就是其高质量的语言和高超的修辞手法的运用。人类的交流要是缺了这些,在许多情况下是不可想像的。所谓“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就是这个道理^[8](p.62)。实际上,在我国外贸、外经、银行、旅游等“实用”领域里,有相当数量的身居要职或担当重任者是读外国文学出身的。1996年,我们曾经对在浙江省经济部门工作的英语系毕业生的工作状况进行过一次调查(回答问题的都是有关单位的领导)。调查结果表明,与外贸系、旅游系和各种新兴院系的毕业生相比,那些走过“文学道路”的英语系毕业生往往在工作的头一两年处于劣势,但是他们大都后劲十足,不久便跑在了前面。

我们并非认为有文学背景的人自然而然地就具有良好的素质,并受到社会的欢迎。英语文学

^[7] 转引自 Donald Stone, *Communications with the Future*,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7, P.2.

的讲授对于中国教师来说,是一个极富挑战性的工作,如果处置不当,反而会适得其反,最终扼杀学生对文学的兴趣。实际上,许多英语专业的学生对文学丧失兴趣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们的许多英语教师(包括外籍教师)组织课堂教学不得法。根据我们两年前在国内十所高等院校(大部分为地方院校)进行的一次随机取样问卷调查,约有34%的英文学教师被学生认为上课枯燥、沉闷,原因是这些教师总是满堂灌,很少与学生交流。大多数教师虽然提问,但是由于学生常答不上来,结果索性从头至尾进行独白式授课。许多教师(尤其是外教)将学生的沉默归咎于“东方式的害羞”,这其实是个谬误。问题的要害在于以下两个教学环节缺乏充分的准备:

第一,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确保学生做到课前预习。在多数情况下,教师布置的作业是要求学生带着问题去阅读某一部作品,要求他们找出主题,熟悉作品情节、人物塑造、意象及其风格,等等。可是,这样的作业通常还不如让学生自己去发现问题来得奏效,因为它忽视了学生的文化背景。如果一个学生觉得自己跟所读的作品之间没有什么文化关联性,那他/她是提不起兴趣的。因而,我们的教师在设计问题时,必须帮助学生意识到有关文本的声音与他们自己的个人和社会生活之间的联系。

第二,如本文第二段中所述,学校没有开设文学预备课来为学生排除一些典型的学习障碍。在西方,英语专业的学生在入学前就已经广泛涉猎西方文学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早在儿童时代就读过有关潘多拉(Pandora)、米诺斯(Minos)、米诺陶洛斯(Minotaur)的故事,以及兰姆改写的《莎士比亚故事选》等文学名著。相比之下,我国英语专业的学生通常是白手起家的,许多人要到三年级时才开始接触原著。面对突如其来的大量文学形式和内容,许多学生往往感到措手不及,力不从心。陌生的新课,加上没有合理的过渡阶段,这就是一个个潜在的英语文学爱好者被扼杀在摇篮里的原因。

那么,我们怎样才能激发学生对英语文学的兴趣呢?又怎样使他们的兴趣保持下去并因势利导,使之成为一种受教育的经历?这些问题都至关重要,因为它们不仅关系到教师的教学方法,而且还关系到对付上文提到的、敌视文学课的倾向的手段。我们作为英语教师,或许无法说服某些官员、用人单位以及学生家长们去重视英语文学的教学,但是我们至少可以通过教学赢得学生的兴趣。换言之,必须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和对策来努力提高我们的教学质量。

首先,我们应当千方百计地唤醒学生对所读作品作出发自内心的反应。唤醒得越早,我们就越有希望成功,这是因为年轻人敏感,可塑性强。海伦·万德勒曾就美国的大学教学发表过如下意见:“如果我们的学生在初识英语系和外语系时,很少得到求知的乐趣,那是因为我们应该提供给他们的最大的乐趣——那些文学课——不知何故没有被纳入一年级学生的课程表中;学生们通常到最后才有机会去接触它们。”[9](p.30)万德勒因此提议,所有新生的英语课“应当至少有一半时间用于阅读神话、传说和寓言;入门语言课也应该如此”[9](p.35)。如果说,美国学生在跨进英语系大门时就被剥夺了“最大的乐趣”,那我们这里就更不用说了。因此,我们的学生更有必要多花些时间来阅读文学。引导一年级、二年级的学生去读些神话、传说和寓言,这不失为一个很好的办法:一方面,学生在阅读这些作品时不会碰到太多的语言障碍;另一方面,又领略了什么是原汁原味的文学,这就为他们更广泛更深入地体验文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强调“乐趣”,还与情感在英语教学中的作用有关。我们的英语教学存在着一个严重的缺陷:不光一些“实用课”的鼓吹者,就连一些文学教师也往往过分强调智力的培养而忽视情感的升华。实用主义者们无视情感教育的重要性(他们在许多情况下甚至错误地将“功能”等同于“智力”),这并不足为怪,遗憾的是我们的许多文学教师也把自己的课仅仅当成了进行智力操练的手段。他们忽视了这样一个道理:没有情感的知性往往导致冷漠和惰性!文学是我们最能发现意识的情感因素的地方,忽视这些因素无异于阉割。当然,我们不是主张情感而反对思想,我们主张的是由感而思

以及由思而感。

怎样才能确保情感与理智不分家呢？海伦·万德勒强调指出，文学课应该把学生引入一种“全身心投入的状态”[9](p.28)。至于确保学生全神贯注、达到忘我境界的具体措施，万德勒并未细说。不过，我们从彼得·阿巴斯那里可以得到这方面的启示：他的“身临其境法”(physical engagement)或许能帮助我们“引诱”学生进入忘我的探索活动中，使学生完全沉浸在审美情趣里。在《教育的当务之急》一书中，阿巴斯详尽地介绍了一整套策略，包括“口头再创作”、“用清晰的声音表达所注意到的要点”、“批判性的评价”以及“创造性的发挥”等，目的在于“把学生的感情、感觉、想像力和智慧都调动起来并带进语言形式之中”[3](pp.151-154)。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阿巴斯的如下提议：“把文学创作的实际经验纳入英语学习的任何课程之中”，以培养学生“对语言手段以及形式的可能性的高度敏感性”[3](p.153)。阿巴斯还告诫学生“不要局限于以分析的模式写作（尽管它自有用武之地），而要用一切富有表现力的语言来写作”[3](p.153)。这话听起来可能有些偏激，但是细细思考一下，我们不得不同意阿巴斯的建议：如果我们的学生学会了与各种形式的文学打交道，那将来还有什么其他形式的文章（当然是指写作技能而言）能难倒他们？还有什么经验比这更具有实用性呢？

另外一个阻碍中国英语文学教学的问题是，有相当数量的教师对文学理论有强烈的抵触情绪。例如，1999年5月在厦门召开的全国英语文学研讨会上，与会者专门就是否该对我们的学生讲授理论知识这一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一些学者坚持认为，英语文学教学应该像利维斯所说的那样“拥抱具体”，而理论的干扰犹如污染，会破坏具体文本的纯洁性和阅读时的新鲜感。根据我们自己的教学经验，我们深深地感到，结合一些理论热点和评论界的辩论来讨论文学作品不仅能激发学生兴趣，而且能活跃课堂气氛。我们还可以从著名美国学者杰拉德·格拉夫叙述的一段亲身经历中得到启发：在上大学时，他一直觉得文学枯燥无味，直到有一天，他的老师在讲解《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时介绍了评论界的一场争论，即作者是否应该在写完黑人吉姆被孩子们营救之后便见好就收，这方面的争论以及一些相关的理论问题大大激发了格拉夫的兴趣，从此他跟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格拉夫由此意识到，许多学生跟他一样，“为经历纯洁，首先必须受些污染”[10](pp.38-40)。他还这样解释学生在文学课上的沉默寡言：

问题就是这样：学生对文本所能发表的观点不单单依赖文本，而且还依赖他们与评论界的关系。长期以来，评论界已就某些特定作家、作品乃至整个文化背景确定了一整套议题，形成了对有关问题的见解。如果把学生从这样的评论界和辩论活动中隔离出去，或者只让他们接触由一系列话语代表的支离破碎、互不连贯的东西，那么他们就很可能在文本面前一言不发，或仅仅发表几句有限的个人之见而已。[10](p. 42)

格拉夫眼里的美国学生的问题同样也是我国学生所面临的问题。必须进一步指出的是，引入评论界的争论和理论性话题并不一定会污染文本的纯洁性和阅读时的新鲜感。也以《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为例：教师可以先不把有关整部小说的争论和盘托出，而专就小说是否应该在吉姆被营救以后就结束这一点介绍一些不同的见解，这样，学生仍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获得阅读的新鲜感；等到学生阅读完整部小说之后，教师再来介绍争论的其余部分，以进一步加深学生对作品的体验和理解。

综上所述，英语文学的教学不仅是我国英语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且与我们的现实生活密切相关——在文化领域是如此，在经济领域也同样如此。由于这种关联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出现了本文中提到的诸多问题。换言之，“文学道路”与我们的实际生活道路是紧紧相连的。在增强这方面意识的同时，我们有必要大力改进文学教学的质量，通过在一年级、二年级增加文学的比重、把具体的作品置于整个批评话语、融感情和理智于一体等手段，真正激发学生对文学的热情，从而使我们的“文学道路”越走越宽敞。

[参 考 文 献]

- [1] 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英语组. 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 [2] 北方课题组. 关于外语专业毕业生的调查报告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98, (3): 1-5.
- [3] Peter Abbs. The Educational Imperative: A Defense of Socratic and Aesthetic Learning [M]. London: The Falmer Press, 1994.
- [4] Peter Abbs. Autobiography in Education [M]. London: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1974.
- [5] John Henry Newman. The Idea of a University [M]. 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82.
- [6] Terry Eagleton. The Rise of English [A]. In David Richter (ed.), Falling into Theory [C]. Boston: St. Martin's Press, 1994, 44-54.
- [7] Donald Stone. Communications with the Future [M].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7.
- [8] 陆建德. 破碎思想体系的残篇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 [9] Helen Vendler. What We Have Loved, Others Will Love [A]. In David Richter (ed.), Falling into Theory [C]. Boston: St. Martin's Press, 1994, 27-36.
- [10] Gerald Graff. Disliking Books at an Early Age [A]. In David Richter (ed.), Falling into Theory [C]. Boston: St. Martin's Press, 1994, 36-43.

[责任编辑 徐 枫]

Let “The Road of Literature” Be Rehabilitated

YIN Qi-ping, CHEN Shu-bo

(Department of English,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Abstract: “The road of literature” has recently become a pejorative term. Behind such a phenomenon lurks a prevalent assumption: that English education is a matter of ingesting information, of mastering technique, of acquiring facts and know-how, whereas literature is a soft option, an indulgence or a mere trimming to decorate the hard center of the market-oriented syllabus. In order to counter such a trend, we need first of all to address the following theoretical issues: What is the primary task of an English department in China? Is the teaching of English literature relevant to the Chinese market economy today? If yes, in what way is it relevant? How does one persuade a member of modern Chinese society that there is a profit in reading, say, Chaucer and Shakespeare in harkening to any non-Chinese and, “worse”, non-modern non-Chinese voices? While re-examining those questions, we need to improve some of our teaching methods that are still prevalent today, in order to make sure that literature is given its due status in English teaching programs.

Key Words: English literature; English education; value of literature